

天一阁藏顾广圻校《仪礼注疏》考述*

周 慧 惠

内容摘要:天一阁藏顾广圻校《仪礼注疏》,为明万历二十一年北京国子监刻崇祯重修《十三经注疏》本,校本主要是宋刻单疏本《仪礼疏》,并参校影宋抄本《仪礼要义》等书。是书经顾广圻数度批校,校改不下千处。顾广圻是张敦仁汇刻《仪礼注疏》、汪士钟刻《仪礼疏》的实际主持者。张本所用的宋本疏,并非直接来自宋本,其依据即为天一阁藏的顾校本;而汪刻虽然号称“覆宋”,但其实对宋本有大量有意识的校改,其校改痕迹也保留在顾校本中。另外,段玉裁、阮元所依据的单疏本均来自顾校本。一般认为,顾广圻校勘古籍以不轻易改动原文为特色,但从该书来看,他的校勘思想或许更为复杂多变。

关键词:天一阁 《仪礼注疏》 顾广圻 校勘实践 “不校校之”

今宁波天一阁博物馆藏有甬上藏书家捐赠的大量珍贵文献,其中入选“国家珍贵古籍名录”的顾广圻校《仪礼注疏》^①就是浙东大藏书家朱鼎煦之旧藏。朱鼎煦(1885-1968),字酇卿,号香句,浙江萧山人,寓居宁波,为民国著名大律师。其书楼名曰“别宥斋”,藏书数十万卷,珍槧秘本无数,后均归天一阁^②。顾广圻校《仪礼注疏》(下称“顾校本”)是朱氏甲申(1944)闰四月得自于书贾林芸葆的。据该书题跋及朱氏日记云,朱氏以《宁波府志》、《四明六志》、《奉化志》、《馮姚志》、《镇海志》、《象山志》并残《台州府志》、《慈溪县志》

* 本文受201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“天一阁所藏文献分类整理与研究”(项目号13&ZD089)资助。

①该书入第三批“国家珍贵古籍名录”,编号07321。天一阁官网“古籍数字资源入口”提供全文浏览服务,网址:<http://www.tianyige.com.cn/Main.Asp>。

②1979年8月17日,朱家后人将别宥斋藏书十万馀卷,又字画900馀件,器物800馀件捐赠给天一阁。

等作价六千元,复出七千元与易,往返六次始得^①。

一、顾校本之简介

顾氏所校本为万历二十一年(1593)北京国子监刻崇祯重修^②《十三经注疏》本(下称“北监本”),共十七卷,六册。半叶九行,行二十一字,双行小字同,左右双边,白口,黑鱼尾,版心皆记刊刻年份。每卷标题次行分别列校刊及重修者祭酒司业衔名。书内钤有“思适斋”、“顾涧蓢手校”、“顾广圻印”诸印,并“修竹吾庐”、“治书轩”、“萧山朱氏别有斋藏书印”等藏书章。书中夹有顾广圻为汪士钟覆宋刻单疏本《仪礼疏》所撰《序》及《后序》手稿五叶。该手稿写在版心镌有“裕隆号”的红格稿纸上,为顾广圻代汪士钟所作《重刻宋本仪礼疏序》,以及自撰的《重刻宋本仪礼疏后序》之底稿,文字与《思适斋集》卷七中的两篇序文基本一致,修改处亦若合符节,故为顾氏手稿无疑^③。

是书经顾广圻数度批校,正讹补脱,去衍乙错,熟雠精校,朱墨灿然,顾氏手迹遍布全书,校语上千条,署有时间的校语约176条,校语中偶有“顾广圻”、“广圻”、“涧蓢”、“千翁”等署名以及“江宁”、“扬州”等地名。部分校语亦涉及顾氏校勘时所用之书,除了最重要校本宋刻单疏本《仪礼疏》与影宋抄魏了翁《仪礼要义》之外,还参校了宋刻《仪礼图》、朱熹《仪礼经传通解》、叶林宗影宋抄《经典释文》、卢文弨《仪礼注疏详校》、沈彤《仪礼小疏》等。但顾氏校勘的对象仅为疏文,基本不涉及经和注,因为经注另有校本,即以唐开成石刻及宋刻严州本《仪礼郑氏注》校明嘉靖徐刻三礼本^④。顾氏校勘北监本的时间跨度很大,始自乾隆六十年(1795),迄于道光十年(1830),历三十五年之久。从青春鼎盛的三十岁到学力精纯的六十五岁,顾广圻对《仪礼注疏》的校勘几乎贯穿了他整个学术生涯。期间他四处替人校书,辗转谋食,足迹遍至吴中、杭州、庐州、江宁、扬州等地。至晚年,“失馆困顿,时苦肝疾”^⑤,并于道光十年中风卧病^⑥。然而他念兹在兹,卅年一觉缥緲梦,一直致力于此书的校勘。

顾校本在校勘的过程中就被当时的学者奉为圭臬,纷纷传抄。张敦仁以顾

①该题跋为朱鄮卿先生撰于顾校本夹板上。1944年5月6日至24日《别有斋日记》亦有关于该书入藏始末的记载。

②该书每卷卷端均署有衔名“皇明朝列大夫国子监祭酒臣吴士元奉旨重修”。吴士元,崇祯五年(1632)至七年任国子监祭酒。故该书应为崇祯间重修本。

③周茹燕:《读顾千里“重刻宋本仪礼疏序跋”手稿》,《文献》1985年第3期。

④国图藏有该校本的张敦仁过录本,著录于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经部1801号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3年。

⑤李庆:《顾千里研究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9年,第228页。

⑥李庆:《顾千里研究》,第244页。

校本为疏文底本合刻《仪礼注疏》^①,后阮刻十三经中的《仪礼注疏》即为覆刻张敦仁本^②;阮元《十三经校勘记》之《仪礼注疏校勘记》所引单疏本亦为顾校本^③;段玉裁也曾将顾校本临出一部,用来订正朱熹《仪礼经传通解》的转改之失^④;大藏书家周锡瓚在其家藏汲古阁本《仪礼注疏》上亦过录顾校本,后为学者王欣夫再次过录^⑤;而号称覆宋的汪刻单疏本《仪礼疏》与顾校本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清代最负盛名之经学家的经学著作、最权威最通行的经学刊本,若追根溯源,则顾校本实为昆仑源,因此,天一阁藏顾校本在清代学术史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。

然而,此书历来为藏家所珍,鲜有面世,朱先生捐赠天一阁后,又深藏阁中,学者无以得见,故学界从未加以利用。神田喜一郎、陈乃乾、汪宗衍、赵诒琛等人所作的顾广圻年谱未见提及顾校本。李庆的《顾千里研究》广事考订,其中《顾千里校书考》细述顾氏所校《仪礼》诸书的原委和流布状况,并作“书本流布图”,材料之丰,用力之勤,无出其右者,然而亦未涉及最关键的顾校本。乔秀岩在《〈仪礼〉单疏版本说》中严密考证,用重重证据推断出存在一“顾千里用宋刊单疏校通行注疏本”,论证了其在《仪礼注疏》刊刻流布中的地位,并进一步猜测该校本或许就是天一阁藏本,但他未曾前来访书,故只能怅然曰:“则天一阁本乃顾氏手校本,或为北图本周香严录顾校所自出,又或即张本所据、《校勘记》所祖之原本,未可知也。”^⑥今笔者不揣浅陋,将天一阁藏顾校本的基本情况、顾氏校勘特点、校勘具体过程加以简述与勾勒,并对顾校本与汪刻单疏之关系略加探讨,抛砖引玉,以求方家关注此天一阁藏顾广圻校《仪礼注疏》。

二、顾校本之校勘

清人好校书,但具体的校勘过程、思路、细节因为文献的缺乏而甚少为人所知,学者只能通过对某部校本详加剖析方能略窥其状。顾校本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模板。经过对顾校本题跋、眉批、校语、符号、墨色等的仔细分析,我们可以梳理出顾广圻数度批校的具体时间、特征、参校之书,以及校勘细节与目的。

①《重刻宋本仪礼疏序》云:“于是张古馥太守得其校本,别合严州经注重编于江省。”(《顾千里集》卷八,中华书局,2007年,第126页)

②乔秀岩:《〈仪礼〉单疏版本说》,《文史》第50辑,中华书局,2000年,第42页。

③《仪礼要义五十卷宋刻本》云:“中丞阮公将为《十三经》作《考证》一书,任《仪礼》者为德清徐君新田,新田与九能有姻亲,曾传抄是书,近日复从余所持旧校景德本去,临出一部。”(《顾千里集》卷十七,第261页)

④《重刻宋本仪礼疏序》云:“唯时段若膺大令亦得此校本,谓之单疏《仪礼》,亦订正自来用《经传通解》转改之失。”(《顾千里集》卷八,第126页)

⑤王欣夫:《蛾术轩篋存善本书录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2年,第1122页。

⑥乔秀岩:《〈仪礼〉单疏版本说》,《文史》第50辑,第47页。

1.嘉庆四年(1799)、道光九年(1829):以宋单疏本《仪礼疏》校

乾隆五十八年(癸丑,1793)除夕,黄丕烈得宋刻单疏《仪礼疏》五十卷(下称宋本),该书叶三十行,行二十七字,末叶列宋时诸臣官衔,阙卷三十二至三十七^①。当时黄、顾等人均鉴定其为北宋景德年间本^②,今学者认为乃南宋孝宗末年至光宗间刊元修本^③。黄得此书后,顾氏跋之曰:“此宋时官疏本,分卷五十,尚是贾公彦等所撰之书,不佞在士礼居勘之一过,于世行各本,补其脱,删其衍,正其错谬,皆不可胜数……实于宋槧书籍为奇中之奇,宝中之宝,莫与比伦者也……嘉庆五年岁在庚申七月,元和顾广圻识。”^④按,嘉庆五年(1800),顾广圻为黄家西席,有条件看到宋本。据顾校本各卷卷首和卷尾的校勘题记,此次校勘始于嘉庆四年(己未,1799)九月初八,终于嘉庆五年七月廿六,与“仪礼疏跋”记载的时间正好相符。

这次校勘非常细致,通篇用朱笔,不仅将宋本与北监本文字的不同一一校出,而且把宋本的异体字、避讳字都誊录到北监本里,甚至将宋本经文的起讫、卷端的结衔、每一卷每一叶每一行的起止均在北监本中一一加以标志,并且标出宋本的卷次、叶码、阙卷、阙叶、修板、烂板。也就是说,顾广圻把宋本所有能用校勘文字表达的全都标注到北监本上,校勘符号统一,指向明确,形成了严密的体例。试举例如下:

(1)异、脱、衍、倒,异体字、避讳字

异文的处理。如《序》/Y1/A6/6^⑤,北监本作“曰”,宋本作“日”,顾氏将“曰”用“○”圈去,在右边写上“日”;《序》/Y1/A4/5,北监本作“末”,宋本作“夫”,顾氏在“末”右上方用“┐”标出,然后在同一行的地脚写上“夫”(见图1)。这两种符号代表了对异文不同的处理方式,详析见后文。脱文的处理。如V1/Y4/B4,北监本作“故云嫌蓍之灵”,宋本作“故云嫌蓍龟之灵”,顾氏在“蓍”与“之”间的右边添上“龟”字。衍文的处理。如V1/Y1/A6/14,北监本作“仕”,宋本无,顾氏将“仕”加方框。倒文的处理。如V1/Y8/A1,北监本作“若中士下士也”,宋本作“中士若下士也”,顾氏以符号“乙”将之乙正。异体字的处理。如V1/Y3/B7/8,北监本作“庙”,宋本作“廟”,顾氏在“庙”上径改为“廟”。避讳字的处理。如V1/Y1/A6/9,北监本作“玄”,V1/Y1/A7/18,北监本作

①该书后入汪士钟艺芸书舍,又归无锡蔡氏,光绪初年犹存,现不知所踪。详见王欣夫:《蛾术轩篋存善本书录》未编年稿卷四《仪礼注疏五十卷》,第1634页。

②屠友祥校注:《尧圃藏书题跋》,上海远东出版社,1999年,第940页。

③乔秀岩:《〈仪礼〉单疏版本说》,《文史》第50辑,第56页。

④《顾千里集》卷十七,第260页。

⑤此处的数字依次表示:篇(卷)/叶/行/字。V代表卷次。Y代表叶次。A代表简子叶的上半面,B代表下半面。下同。



图 1:《仪礼注疏》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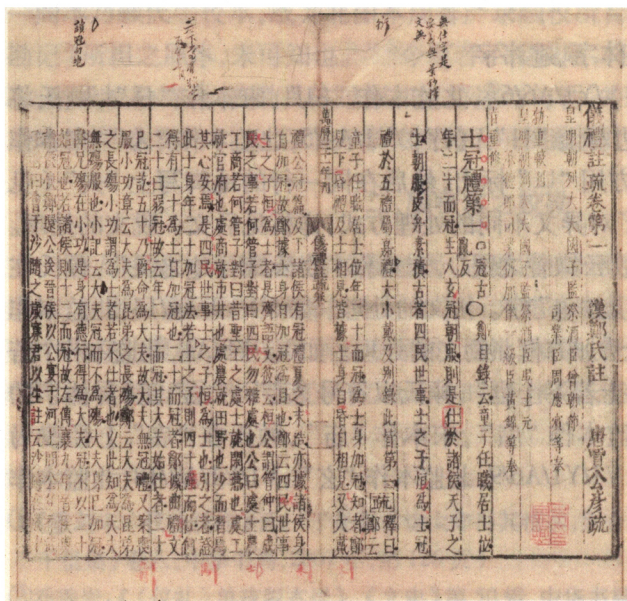


图 2:《仪礼注疏》卷一卷端

“恒”，顾氏将两字的末笔直接抹去（见图2），则知宋本分别作“玄”和“恒”。

（2）经文的起讫

宋人刻经，“北宋本必经注自经注，疏自疏，南宋初始有注疏”^①，注疏合刻到了明代才流行。此宋本为单疏，经注只标起讫，而北监本则经注皆全。因此，顾广圻在校本中将经文的起讫用“某某至某某”的方式一一标出^②。比如，V1/Y29/B2，北监本的经文作“宾如主人服赞者玄端从之立于外门之外”，顾广圻在“宾如”和“之外”右旁加小圈，并补上“至”字，旁亦加小圈，也就是说，宋本的经文是“宾如至之外”。顾广圻对宋本的这个特点大加赞赏：“其所标某至某，注某至某，尤有关于经注，而各本刊落窜易殆尽，非此竟无由得见。”^③这也正是宋本的价值所在，故顾校本照录不爽。

①《顾千里集》卷一，第3页。

②关于《仪礼》的注文，北监本在“疏”中亦以“某某至某某”的方式标出，故顾校本没有做标记，但是如有与宋本不同者，仍加以校勘。

③《顾千里集》卷十七，第260页。

(3) 卷、叶、行的起止

比如,顾校本将底本序的标题“仪礼注疏序”用朱笔圈去“注”与“序”二字,在下方补上“卷第一”三字,并在结衔和序文之间补上“仪礼疏序”四字,因为宋本的卷一是包括序的,这样,顾广圻就将宋本卷一的起点搬到了北监本上;接着,在北监本 V1/Y18/B6 最下方“也”字处,用朱笔标上“L”的符号,并在该行的天头写上“空一行 仪礼注疏卷第一 仪礼注疏卷第二 第三行名衔 低四格”字样,表示宋本的第一卷到此结束,第二卷开始。所谓的“低四格”是指第三行的名衔“唐朝散大夫行太学博士弘文馆学士臣贾公彦撰”应比卷端题名低四个字。同样,顾校本将宋本每一叶的起止均用稍小的“L”在北监本中标出,并且在该行的天头写上页码,每一行的起止也用小红点点出。将之与现存的汪士钟重刻宋单疏本一一比对,行款毫发不爽。

(4) 阙卷、缺叶、修板、烂板

黄丕烈购得宋本时,该书已经失去卷三十二至三十七,这六卷在北监本上为卷十一的后半部分与卷十二的全部。因为没有宋本可校,故顾校本上的这一部分没有标卷次、页码等,并在 V11/Y70/A5,也就是宋本三十一卷结束处,钤“顾印广圻”,以示郑重。宋本除阙卷外,还有零星缺叶,顾广圻在北监本某些卷的卷末一一罗列,如卷一末朱笔校语:“内缺者一叶三卷十。”意为宋本卷三第十叶缺。经顾氏统计,宋本共缺十三叶。对宋本的修板与烂板,顾校本也如实反映。如 V1/Y2/B 天头,写有“修”字,意为宋本在这里有修板现象;又如 V14/Y41/A 地脚,连写三个“烂边”。

从整体来看,顾广圻此次校勘的目的应该是最大程度保留宋本的原貌。宋本难得,能见宋本者少之又少,现将宋本整体移至北监本,则又一宋本出矣。对于宋本,顾广圻有“剟其菁英,句排字比,勒成一书,流传寓内,庶几贾氏之精神不蔽,而问途此经者享夫榛芜一辟之功”^①的愿望,故将宋本的所有面貌都悉心保存。顾校本因其对宋本的忠实态度而为当时学者所重,在阮元十三经局任职的徐养原曾临出一部,用于作《仪礼注疏校勘记》^②。

自此之后,顾广圻一直没有停止对《仪礼》疏文的校勘,但宋本不易再见,故仅以他书校之。道光八年(1828),他从扬州秦恩复处回吴中,替汪士钟艺芸书舍校书为生^③,可能在道光九年己丑,他再次看到从士礼居流入艺芸书舍的宋本《仪礼疏》,因此重校宋本。关于这次校勘的日期有眉批校记可证之:V8/Y100/A 天头上有朱笔眉批曰:“‘子’字起‘耳’字止,宋本无之。别有《丧服记》疏误入于此。”旁有墨笔云:“二百九十二字,当是修板而舛错耳。”V11/Y101/B 天头有朱笔眉批曰:“‘浅’字起‘期’字止,错在廿三者。校。己丑。”

①《顾千里集》卷十七,第260页。

②《顾千里集》卷十七,第260页。

③李庆:《顾千里研究》,第233页。

也就是说,宋本《丧服记》中有二百九十二字,因修板原因,误入卷廿三《聘礼》中。这个错误,顾广圻第一次校宋本时即已发现,因此《仪礼注疏校勘记》卷二十三提到了这一情况^①,只是当时还没有想到利用这二百九十二字来校勘。直到己丑,顾广圻重见宋本,便以此误入者校《丧服记》疏文。比如 V11/Y101/B7,北监本“此服必服麻衣縗衣者”,宋本误入部分“縗衣”作“縗缘”,顾广圻以朱笔径改“衣”为“缘”,并在该行地脚注上“宋”字,表明宋本作“缘”。这一校改就是己丑时所作,故张敦仁本卷三十三仍作“縗衣”,《仪礼注疏校勘记》亦不提宋本作何字,只引段玉裁校本作“縗缘”^②。

除了上述这条校记外,另有多条眉批为此次校勘留下的痕迹。笔者翻阅顾校本,发现有许多朱笔“宋某字”的校记。比如 V1/Y36/A4/19,北监本作“一”,顾广圻将“一”径改为“亦”字,然后在该行的天头写上朱笔“宋亦”。有意思的是,在此二字之上有用墨笔写的“《要义》亦”三字,可能是早年顾广圻用《仪礼要义》校出此字,此次用宋本加以印证。另有一种特殊情况亦可佐证这个观点。比如 V1/Y36/B6/7,北监本作“子”,在该行的天头有墨笔“‘子’当作‘中’”,然后用朱笔在下方校曰“宋已误”。可见顾广圻曾经理校,认为此处“子”当为“中”,北监本有误,后以宋本校,发现宋本亦误。这两种校勘形式遍布全书,仅卷一就有十五处,整部书无虑二百多处。观其字体风格,与朱笔己丑的校记相类。值得注意的是“己丑”这个时间。翻检全书,在眉批中注明“己丑”的校记有五十一条,“庚寅”的校记两条^③,基本为墨笔,几乎分布在每一卷中。考其校语,似为理校,如“‘礼’当作‘聘’”(V2/Y36)、“‘其’当在‘为’上”(V4/Y12)等。己丑、庚寅前后顾广圻在汪家校书,有机会再次看到宋本,故我们可以推测:就在此时,顾广圻再次用宋本通校全书,并且同时进行了大规模的理校。

本次校宋的目的应该是顾广圻为汪士钟重刻单疏《仪礼》作前期准备。道光十年九月,汪刻《仪礼疏》出,乃顾氏成其役。两次校宋虽然相距近三十年,关注点不同,体例亦变,但还是有其相同的特征,即均用朱笔校勘。眉批中但凡以朱笔写就的校语,大抵与这两次校宋相关。

2.嘉庆七年至十一年(1802-1806):以魏了翁《仪礼要义》校

宋刻魏了翁《仪礼要义》五十卷,宋淳祐十二年(1252)徽州刻本,印本清

①《仪礼注疏校勘记》卷二十三“为夫人世子六升衰裳”条曰:“自此句‘子’字起,至‘下略为一节耳’句止,共二百九十三字。此本误错《丧服》传疏。”(《十三经注疏》,中华书局影印阮元校刻本,2009年,第2316页)

②《仪礼注疏校勘记》卷三十三“此服必服麻衣縗衣者”条曰:“段玉裁校本下‘衣’字作‘缘’。”(《十三经注疏》,第2431页)

③庚寅这两条分别标注为“庚寅二月”(V9/Y6)和“庚寅”(V13/Y30),时间紧承己丑,校语内容相类,故可认为与己丑属同一次校勘。

朗,为严久能藏书^①。嘉庆七年六月,严久能将宋本携至顾广圻杭州西湖寓所,并另以影宋抄本一部^②出借。时顾氏正入阮元十三经局任《毛诗》校勘,一见,叹赏此宋刻乃“天地间第一等至宝”^③。他对此书评价这么高,不仅仅是因宋槧而珍重,还因为其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:宋本单疏阙六卷,可据此以补全;并且,此本文句与通行本异者,必与宋本相合。嘉庆九年五月,顾广圻索性借严久能的影宋抄自己抄了一部备用^④。

顾广圻以《仪礼要义》(下简称《要义》)对北监本的校勘可能进行了三次。其中一次校勘具体年月不详,大概在嘉庆七年顾广圻见到《要义》之后。此次校勘有一个共同体例,即在地脚处出校的字旁画一个小圈,然后在下方用朱笔注上“《要义》同”三字。如 V1/Y3/B7/14,北监本为“諏”,该行地脚写有朱笔“取”,旁加小圈,下批“《要义》同”;V1/Y6/A8/2 后,朱笔补脱“冠事”二字,旁加小圈,下批“《要义》同”。此类形式的校勘在书中比比皆是,仅卷一就有十处。它们有几个共同点:①朱笔;②位处地脚;③字旁有圈;④校语均为“《要义》同”。可见,此次校勘的目的就是以《要义》校单疏,以求判断单疏的正误,详细分析见后文。

另一次当在嘉庆八年癸亥年底至嘉庆九年甲子。时顾氏已离开杭州十三经局,自此之后,奔走四方,以校书糊口^⑤。关于这次校勘,顾校本上线索很少,只有三条眉批提到了日期^⑥,均为墨笔。迟至嘉庆九年五月,顾广圻才拥有自己的《要义》影宋抄本,故此次校勘应该是以严久能借给他的影宋本作为校本的,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经部 1835 号著录“《仪礼要义》五十卷 清乾隆五十七年严元照抄本”,上面确有顾广圻的校。

依据各卷卷首和卷尾的校勘题记判断,第三次校《要义》当是从嘉庆十年十二月十六日起,嘉庆十一年六月廿五日止。时顾广圻为张敦仁刻抚州本《礼记》,寓居江宁^⑦。这次校勘的日期亦可以影宋钞本《仪礼要义》的跋来印证:

①该书钤有“蕙榜”、“元照私印”、“修”、“张氏秋月字香修一字幼怜”各印,均朱文。傅增湘按:“此书九能没后乃散出,盖在嘉庆时,不知缘何入于中秘,或臣工进呈及抄没贵家所得也。”(傅增湘:《藏园藏书经眼录·仪礼要义五十卷》,中华书局,2009 年,第 42 页)现藏台北故宫。

②此本现藏国图,著录于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经部 1835 号。

③《顾千里集》卷十七,第 261 页。

④《顾千里集》卷十七,第 262 页。该书现藏国图,著录于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经部 1837 号。

⑤李庆:《顾千里研究》,第 94 页。

⑥即:“‘经’字依《要义》是‘去’之误。癸亥十二月”(V1/Y55)、“《要义》作‘寻’为是。甲子正月”(V3/Y16)、“‘亦’字当衍。又按,此自为文耳。甲子七月定”(V4/Y3)。

⑦李庆:《顾千里研究》,第 106 页。

“丙寅六月廿五日,用单疏本互勘一过,时在江宁寓馆,涧菴居士。”^①这里所说的单疏本就是顾校本,即用这两个顾广圻认为有关《仪礼》最好的本子互勘,以纠谬补缺。例如:V1/Y38/B5/18,北监本作“卿”,宋本作“乡”,此行天头上有墨笔眉批“‘乡’字是,《要义》‘乡’”;V2/Y53/A5“云宗子者适子也者”,“适”字后用朱笔补上“长”字,上有墨笔眉批“单疏本脱”、朱笔眉批“《要义》有”;V1/Y37/B3/13,北监本作“必”,宋本作“心”,上有墨笔眉批:“‘心’当依《要义》作‘以’,若注作‘必’,贾当疏之。单注本‘以’。”此类眉批很多,遍布各卷。

此次校勘的另一个重要成果就是用《要义》来补校宋本的阙卷。卷十一末有朱笔跋:“自卅二卷起,依《要义》所载校正。嘉庆丙寅,时在江宁郡中,涧菴。”卷十二末朱笔跋:“右皆《要义》校。共六卷,凡勘正二百许处。”影宋钞本《仪礼要义五十卷》之题识亦云:“右三卷,赖以正今本《注疏》之误者特多,以下三卷差少,于此益惜单疏本之不完也。江宁寓中灯下读,并记。涧菴居士。”“自卅二卷以下,单疏阙六卷,使无《要义》,并匡略亦不得知矣,此书之可宝在是也。涧菴漫记,卅日覆校。”检顾校本卷十一叶七十至卷十二,再无与宋本有关的校语,叶与行的起止也不再做标志,只在每卷的开始处标上“《要义》某某卷起此”的字样。

此次校勘历时半年有馀,其目的当是为张敦仁汇刻《仪礼注疏》做准备^②。检眉批注有“丙寅”^③者,凡四十二处,均为墨笔,考其校语,除个别外,似为理校,如:“‘下’当作‘上’。丙寅四月”(V5/Y64)、“‘主’当作‘一’,即上文‘一人’也。丙寅六月”(V4/Y21)等。这些校记与宋本、《要义》均无涉,可能是顾广圻在两书互校的同时又将全书通读一过,表达了自己的学术见解。

3. 其余校勘日期

(1) 乾隆六十年(乙卯,1795)

乙卯是顾校本中最早出现的日期,共四次。校语均为墨笔,如“‘彼’当作‘破’。乙卯七月”(V12/Y36)、“中脱文。乙卯九月”(V12/Y62)等,似为理校,当为顾广圻借观宋本前,读北监本后得到的一些看法。

(2) 嘉庆十二年(丁卯,1807)

嘉庆十一年六月张刻《仪礼注疏》完成后,顾广圻并没有停止对《仪礼》的校勘。接下来的丁卯这一年,从二月到十月,顾校本均有墨笔校语出现,共十八次。如“‘屈’者,‘属’之误,下句云‘属之经’可证。丁卯五月”(V11/Y68)、“‘德’当衍,‘功’句绝。丁卯十月”(V15/Y47)等,其校语的墨色和内容均与丙寅的理校相类。检张刻《仪礼注疏》目录有“单疏识误(嗣出)”条,

①《顾千里集》卷十七,第262页。

②嘉庆十一年六月,张敦仁重刻《仪礼注疏》成。

③按,五条仅署“五月”者,当为丙寅五月;卷八叶四十二“廿六日又定”者,当为丙寅五月廿六日。

然而一直未见刊刻。此时顾广圻仍孜孜于《仪礼》校勘,或许是为了作《单疏识误》?资料阙如,不可知也。

(3) 嘉庆二十一年(丙子,1816)

丙子年的这次校勘在顾校本中留下了不少痕迹。卷一首叶有朱笔跋:“丙子六月十六日校刻样起。”卷一末叶朱笔跋:“丙子六月重校刊样,时在扬州,涧蘋记,十九日。”卷三末墨笔跋:“丙子六月再读校定刊本,顾广圻记于扬州寓中。”卷五末朱笔跋:“丙子闰月^①又读。”眉批上关于丙子的校语有四条,分布于第一至第四卷,均为墨笔^②。另,影宋钞《仪礼要义五十卷》之题识里也有关于此次校勘的记载:“丙子六月再读,广圻记。”

此次校勘有两个特点:①所有的校跋只出现于前五卷,卷五后再无丙子校勘信息;②时间只有两个月,即从六月到闰六月。按,丙子年,顾广圻在扬州校刻《全唐文》^③,此时与《仪礼》有关的出版活动只有阮元重刊《十三经注疏》^④。嘉庆四年,阮元建诂经精舍,集天下学人,准备重刊《十三经注疏》,主其事者段玉裁。不意段、顾因学术见解不同而成水火,导致刊刻之事延至嘉庆二十年才重新提上议程,并于嘉庆二十一年刊成,时段玉裁已去世年馀。历来学者认为,顾广圻并未参与阮元的刻经之役,如汪绍楹先生所云:“然当时辑《校勘记》者,顾氏为争端所在,自不能任其事。徐若臧在东,已卒于十六年,洪楹堂卒于二十年,惟严厚民、徐心田诸君尚存,亦虑有门户之见。是以委一不知名之卢宣旬主其事。”^⑤然检顾广圻《仪礼郑注十七卷》(明徐刻校本)之题识有“丙子闰六月初九日再读至此”语,谓顾氏曾同时校勘《仪礼》的经、注于徐刻《三礼》本上,并且,顾校本校语中有“刻样”、“刊样”等词,或许本次校勘就是为阮刻《仪礼注疏》而起?然为何只校前五卷且时间又何其短也?种种疑问,有待于新资料的发现,再来一一辨析。

(4) 道光四年(甲申,1824)、道光六年(丙戌,1826)

在顾校本眉批中注明“甲申”日期的批语共有五条,墨笔,分布于前五卷^⑥。注明“丙戌”日期的批语亦五条,亦墨笔,分布于前四卷^⑦。据李庆《新订顾千里年谱》^⑧,自道光二年起,顾广圻与汪士钟交往日密,道光四年、六年,顾氏均有假汪氏宋本校阅之事。这两次校勘距上次丙子年已经有八年之久,长时间

①嘉庆二十一年丙子有闰六月。

②考其校语,应为理校。如 V3/Y13/B 天头墨笔眉批“当作‘人言’。丙子”。

③顾广圻于嘉庆十九年(甲戌,1814)七月应孙星衍之邀至扬州校刻《全唐文》,嘉庆二十一年七月事毕,返回故里(李庆:《顾千里研究》,第156-165页)。

④阮刻《十三经注疏·仪礼注疏》,卷末均有牌记“大清嘉庆二十一年用文选楼藏本校”。

⑤汪绍楹:《阮氏重刻宋本十三经注疏考》,《文史》第3辑,中华书局,1963年,第33页。

⑥考其校语,似为理校。如 V4/Y15/A 天头眉批:“‘云’当衍。当补‘适’。甲申。”

⑦其校语亦似为理校。如 V4/Y13/B 天头眉批:“有误。当衍‘责人’。丙戌再读。”

⑧李庆:《顾千里研究》,第194-222页。

停顿后又重新启动此学术活动,有可能是为了汪刻《仪礼疏》的刊刻作准备。此推断有一条眉批可资补充证明:V2/Y18/A 地脚处有墨笔批语“道光六年七月十九日校此卷样本。千翁”,这里所说的“此卷”即宋本第四卷。宋本煌煌五十卷,其重刻工作应该需要很长一段时间,故甲申、丙戌这两次校勘或许就是重刻单疏的前奏。

三、顾校本与汪刻

嘉庆末年,黄丕烈士礼居的宋元本开始大量散入同郡汪士钟艺芸书舍,其中宋刻《仪礼疏》亦归汪氏。道光十年(1830)九月,汪士钟聘顾广圻主事,重刻宋本,刊行于世,“念世间无二,遂命工影写重雕之,以饷学子,使数百年来弗克寓目者,今乃可家置一部”^①。《重刻宋本仪礼疏序》认为,此次重刻最大的特点就是忠实宋本,完全保持宋本原貌,不仅行款修板依照宋本,就是缺卷缺叶也各仍其旧,“行摹款仿,尤传景德之真”^②。汪刻《仪礼疏》(下称汪刻)写刻绝精,赏心悦目,号称覆宋,加之宋本今已佚,故学界皆以宋本目之^③。然而真实的情况是,顾广圻对宋本进行了校勘,所谓的覆宋,其实已经过有意识的、大规模的改动,而校改工作就是在北监本上完成的,其成果即顾校本。我们可以根据顾校本中保留下来的校勘痕迹来梳理宋本与汪刻、顾校本与汪刻之间的关系。

正如上文所说,顾校本尽可能地保留了宋本面目,除了行款、卷次等以纯客观的态度抄录之外,对于北监本与宋本异字的出校尤为着意。在校勘过程中,顾氏首先经过初步判断,将两者的异字分为两类,一类为宋本是而北监本非,就用朱笔在北监本上径改,如上文所例举的“曰”改成“日”,直接将宋本所作的某字誊写到北监本上,这种情况在顾校本中十分普遍,但与本节所要讨论的内容关系不大;一类为宋本非而北监本是,顾氏就在异字的右上角以“┐”符号标出,并在该行的地脚注上宋本作某字,如上文例举的“末”,在其地脚处注上“夫”,意即此处宋本作“夫”。

有意思的是第二类情况。顾氏对地脚处所注的宋本某字进行了二次、三次分析,分析的结果在字的右边标以三种符号来区别:小竖(|)、小圈(○)、小三角(▷)。若将之与汪刻相校,我们就会发现:旁加小圈和小三角的字,汪刻亦作该字;而所有旁加小竖的字,汪刻则全部与之不同。试以例述之:

北监本位置	北监本	宋本出校	符号	汪刻位置	汪刻
V1/Y10/B1/4	类	颢	○	V1/Y8/B3/11	颢
V1/Y11/A3/13	则	作	▷	V1/Y8/B13/12	作
V1/Y11/A6/4	北	此		V1/Y9/A2/15	北

①②《顾千里集》卷八,第129页。

③唯学者乔秀岩对此提出疑问,认为汪刻已失却宋本原貌(《〈仪礼〉单疏版本说》,《文史》第50辑,第55页)。

以此校勘体例检验汪刻全书,无一例外者。而小圈与小三角亦有大不同:凡小圈者,应该为第二次分析的结果,如果认为宋字非,则旁加小竖;若难以判断,或通过与《要义》的校勘认为宋本正确,则旁加小圈,并注上“《要义》同”字样^①。而小三角者,乃是第三次分析的结果。仔细看小三角的形状,我们会发现,小三角原本为小竖,后加上两笔将之拉成了三角,也就是说,顾氏在第二次判断时,将这些字归到“宋字非”中去,但经过再三分析,认为证据不足,故用三角撤回原判。

通过对顾广圻校勘细节的勾勒以及与汪刻的比勘,我们可以推断,凡是宋字旁加小竖者,汪刻均没有遵从宋本,而是作了改动。汪刻对宋本的改动主要存在以下几种情况:

1. 宋本中非常明显的错字,汪刻予以改动

这种情况最为普遍。比如序言中有“周礼为末,仪礼为本”句,其中的“末”字宋本作“未”,很显然宋本误。又如卷一中有“少而习焉,其心安焉”句,其中第二个“焉”字宋本作“爲”,也是个明显的错误。顾广圻师从经学大师江声、钱大昕,其经学修养曾得段玉裁赞赏,于《仪礼》自然非常熟悉,故对宋本一些转写、形近、传抄、刊刻之误,能自信地作出判断。在主持汪刻时,他将宋本中的这些明显讹误,全部依北监本予以改动。

2. 宋本中有因烂板、修板而产生的讹误阙如,汪刻予以改正补缺

宋本修板、烂板颇多,最典型的是这两句:“郑云:尊者饰也,士冠不得綏也”,“冠讫则敝之”(V1/Y55/A5)。前句宋本在“尊者饰也”之后有一个字的空白(□),后句在“敝”后有一“经”字。此二字在汪刻本的位置为V3/Y19/A14-15的最末,位于板框处,但已经由宋本的“□”、“经”改成了“经”、“去”。顾校本天头有墨笔眉批(图见封二),将改动原因说得非常清楚:“广圻按,‘经’字当在上行‘□’处,乃宋板剝修,并排‘经’、‘去’等字,刻工误之,故‘经’字反在下行,而‘去’字不见也。”^②又如V2/Y5/B6/7,北监本为“云”,此字位于宋本V4/Y3板框的左下角,因烂板空缺。顾氏校之以《要义》:“‘云’字依《要义》是‘共’之误。”以汪刻验之,果然补以“共”字。一般来说,板框处烂板、修板最多,发生讹误的几率也高,顾氏通过推理、考证,得到了正确的疏文,并将学术成果反映在汪刻上,但汪刻因此而去宋本远矣。

3. 宋本卷末校对诸臣衔名有阙如,汪刻予以补正

宋本卷末有“大宋景德元年六月”校定、再校、都校诸臣姓名及参政王钦若、宰相吕蒙正等衔名。因宋本是孤本,所以这一叶内容无他本可校。顾校本为

①例如,V1/Y3B7/14,北监本作“取”,宋本出校为“取”,旁加小圈,并出校语“要义同”,验之汪刻,汪刻亦作“取”。

②乔秀岩曾利用汪刻、张刻及《校勘记》之间的不同,复原出宋本中的这两句,从而推断出“汪刻不可全信”的结论(《〈仪礼〉单疏版本说》,《文史》第50辑,第55页)。

保存宋本,依原样誊录于书尾,但将宋本漫漶缺失之字用朱笔或据痕迹描补,或以考证填充(图见封二),而汪刻基本遵从顾校本的校补。如“陇西郡开国公食邑三千八百户臣李”,其名宋本缺失,顾校本则补上“沆”,并在天头朱笔眉批曰:“考《玉海》补‘沆’字。”检汪刻,正作“李沆”,并不空名。又“崇文院检讨”,宋本缺其姓名,顾校本补“杜镐”,眉批“广圻按,考《玉海》补‘杜镐’二字”,汪刻补“杜”字,而仍空“镐”。又“国子监直讲”孙奭之姓,宋本唯留“子”旁,顾校朱笔补上“系”,汪刻果作“孙”。此处汪刻改动尤多,与宋本不同者凡十七字。

然而,汪刻对宋本的改动应该还是很慎重的。在绝大多数情况下,如果没有版本依据,哪怕顾校本认为宋本必误,汪刻也不会轻易改动。如 V1/Y2/B7“而以士虞为第八”,顾氏墨笔眉批曰:“‘虞’当作‘丧’,据《疏》引《目录》士丧小戴第八。”同行又有“士丧为第十三”,亦有眉批“‘丧’当作‘虞’,亦据《疏》引《目录》,当如此”。顾广圻认为北监本和宋本在“虞”和“丧”的问题上均有误,且引经据典,言之凿凿,但汪刻仍从宋本,并没有因此而改动。又如 V1/Y36/B6/7,北监本与宋本均作“子”,顾墨笔校“‘子’当作‘中’,有误”,又朱笔校“宋已误”。虽然顾氏断定宋本已误,但汪刻仍作“子”,不改。再如 V1/Y4/A1/5,北监本作“爵”,宋本作“辞”,顾氏眉批曰:“‘辞’亦当作‘辟’,与上文同误也,改‘爵’者非。”又云:“‘辟’之形尚存。”顾氏认为,此处“辞”与“爵”都是错的,宋本虽作“辞”,但尚能看出“辟”的形状^①,应该作“辟”。因为没有版本上的证据,汪刻仍作“辞”,没有改动。

当然,顾校亦有漏校者。如 V1/Y2/B3/5,北监本作“以”,汪刻作“已”,顾校本没有任何校勘痕迹,应该属于漏校。校书如秋风扫落叶,旋扫旋有,宋本《仪礼疏》凡四十七万五千八百四十八个字,顾广圻有几处漏校,既合乎逻辑,也反映事实。

正因为汪刻体现了顾广圻校勘《仪礼》的部分学术成果,所以说汪刻对宋本的改动是有意识的;也因为这样的改动仅汪刻卷一就有 18 处,故言其为大规模的。从顾校本可以推断,汪刻的所谓“尤传景德之真”怕是不能轻信,其对宋本的改动已使它在相当程度上失去了宋本的原貌。宋本最后一次出现是在光绪初年无锡藏书家蔡廷相处,从此茫不可寻,因此学者们都倚重汪刻,王欣夫说:“然则幸有此刊,得长留世间,闾原功不细矣。”^②连怀疑汪刻忠实度的乔秀岩也认为:“今读《仪礼疏》,自当据以为本。”^③而顾校本的存在则证明了:汪刻依据顾校本改变了宋本原貌。

①宋本可能被墨笔描过。《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》中附王颂蔚云:“己卯秋日,访书无锡,至张塘桥蔡氏,见《仪礼》单疏。字多漫漶,以墨笔描写。”己卯为光绪五年(1879)。蔡氏者,蔡廷相,多收藏黄、汪递藏善本。

②王欣夫:《蛾术轩篋存善本书录》,第 1634 页。

③乔秀岩:《〈仪礼〉单疏版本说》,《文史》第 50 辑,第 55 页。

四、顾广圻之校勘学

顾广圻是一位在校勘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学者。他毕生致力于校勘,一生校书不下二百几十种,并以此为稻粱谋。他的校勘订正精审,考辨详明,年轻时,就为段玉裁所器重,称其“博而精”,“校书最好”^①;后又被学界誉为“清代校勘第一人”。他最著名的校勘学思想,即“以不校校之”的理论,被解释为:“书必以不校校之。毋改易其本来,不校之谓也;能知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,校之之谓也。”^②

所谓“不校”,即不轻改原文;所谓“校之”,即主张将校勘成果以“校勘记”、“识误”等形式附原书以行。他在以宋刻姚氏《战国策》校卢氏雅雨堂刻本时,发现卢本虽据陆敕先抄校姚氏本所刻,然而率意窜改,大失其真,实为厚诬古人。因此,他与黄丕烈将士礼居藏宋本“命工纤悉影摹宋槧而重刊焉,并用家藏至正乙巳吴氏本互勘,为之札记,凡三卷,详列异同”^③。他曾与严可均一同为孙星衍校刻宋小字十行本《说文》,严氏拟将宋本酌改付刊,但顾广圻谓“宋槧只当影刊,不可改字,校勘成果宜别著《考异》附后”^④。由此可见,顾广圻对“不轻改原文”的原则还是相当坚持的。而且,后人也将此当作顾氏校勘的最大特点。如杨守敬论顾氏:“近时顾千里创为‘以不校校之’之说,虽明知其误,亦不轻改。”^⑤“不校校之”俨然成了顾广圻校勘思想的招牌。

然而,通过对天一阁藏《仪礼注疏》顾校本的分析,我们却得出了与之相反的结论:顾广圻不仅没有影刊宋本,而且还对宋本进行了大量的有意识地校改。当年顾、段之争,轩然大波,究根溯源,实乃校勘上“版本”与“考证”之争。段玉裁的校勘观点是:“夫校经者,将以求其是也,审知经字有讹则改之,此汉人法也。汉人求诸义而当改则改之,不必其有左证。”^⑥又说:“凡宋版古书,信其是处必从之,信其非处则改之,其疑而不定者,则姑存以俟之。不得勿论其是非,不敢改易一字。”^⑦顾氏激烈反对此说,认为那些著名学者最容易犯“才高意广,易言此事,凡遇其所未通,必更张以从我,时时有失,遂成疮痍”的毛病,斥之为“诬古人,惑来者”^⑧。但从顾校本来看,顾氏又何尝不是“审知经字有讹则改之”呢。

①刘盼遂辑校:《经韵楼文集补编》卷下《与刘端临第八书》、《与刘端临第十一书》,钟敬华点校:《经韵楼集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8年,第397、399页。

②《顾千里集》卷十七,第265页。

③《顾千里集》卷八,第135页。

④李庆:《顾千里研究》第271页。

⑤李庆:《顾千里研究》第273页。

⑥《经韵楼集》卷十一,第298页。

⑦《经韵楼集》卷四,第85页。

⑧《顾千里集》卷十七,第265页。

其实,关于顾广圻的改易宋本,前人亦有论及。如段玉裁言:“建屏不读《左传》,而欲改《易林》之‘子商’为‘于商’。”^①又王国维谈顾广圻:“《释名》无善本,璜川吴氏本出顾千里手,增删及改字太多而不著其所本(殆无所本),其中非无是者,然殊不可为训也。”^②又陈垣《通鉴胡注表微》之《校勘篇》“唐昭宗天复元年”条:“鄱阳胡氏覆刻《通鉴》,主其事者为顾千里,著名之校勘学者也,而纰缪若此。夫无心之失,人所不免,惟此则有心校改,以不误为误,而与原旨大相背驰……顾君覆刻古籍,乃任意将原文臆改,以误后学,何耶!”^③也许严格影宋,不轻改一字,世上只有黄丕烈一人欤?

综上所述,顾广圻的校勘并不是严格意义的“不校校之”。在理论上,他或许还能坚持原则,但在实践上,显然与段玉裁相类。顾广圻的校勘思想、校勘方法可能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。

结语

目录之学为读书之津梁,校讎之学为书籍之药石。清代刻书大盛,字句之讹讹衍倒亦众多,故乾嘉学人尤重校勘之学,顾广圻就是其中的宗匠。他一生奔走,为人校刻,艰难谋食,穷困潦倒,然而凡是由他主持刻成之书,均为士林所重,他的校本更是各大藏书家争相收藏的善本。天一阁藏顾校本《仪礼注疏》是他三十馀年的心血,一直在行篋中伴随他辗转四方,不仅承载了他的学术成果,还凝结着他的生命光影。顾校本是张敦仁合刻《仪礼注疏》、阮元刻十三经《仪礼注疏》、阮元《仪礼注疏校勘记》所用的单疏底本,也是汪士钟重刻宋本《仪礼疏》最重要的依据。后世所刊行关于《仪礼》的书,基本上也与顾校本相关,如《嘉业堂丛书》本《仪礼注疏》,乃翻刻自张本;《公善堂丛书》本《仪礼疏》,乃覆刻汪刻;《四部丛刊》续编本《仪礼疏》,亦是对汪刻的影印。顾校本在清代《仪礼》刊行史上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。

然而,关于顾校本尚有一些问题未能解决。国图藏有黄氏士礼居影宋抄本《仪礼疏》^④,据传与宋本纤毫不差,连断板处皆用自制小印章“断板”二字连接盖上。然笔者未曾寓目,若能将之与顾校本校勘一过,必能得到许多信息。张本与顾校本的关系有文献证明,但如果能进行实物上的版本比对,想来会有另外的收获。阮元《仪礼注疏校勘记》究竟有多少吸取了顾校本的成果,这也是值得探讨的事情。张敦仁本目录上有“单疏识误(嗣出)”条,然而一直未见有刊刻。《单疏识误》是否成书?顾校本中保留了多少关于《单疏识误》的材料?这一切,都值得大家去研究。我们若能进一步挖掘天一阁藏顾校本的价值,也

①《经韵楼集》卷四,第85页。

②转引自李庆:《顾千里研究》,第281页。

③陈垣:《通鉴胡注表微》,科学出版社,1958年,第55页。

④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经部第1808号。

称得上是有功于前贤,有益于后学之举吧。

附录:顾校本《仪礼注疏》中顾广圻校勘题识

- 1.《序》首叶:己未九月初八日校始。(朱笔,有“顾澗蕢手校”印)
乙丑十二月十六日重读。是日立春。(墨笔)
丙子六月十六日,校刻样起。(墨笔,有“思适斋”印)
- 2.卷一末:廿四日始竟此。内缺者一叶:三卷十。(朱笔)
廿二日读。此卷第八叶多修误,今改正。(墨笔)
丙子六月重校刊样。时在扬州。澗蕢记。十九日。(朱笔)
- 3.卷二首:十月初三日始再校。(朱笔)
- 4.卷二末:初九日校竟。缺二叶:六卷一、二。(朱笔)
廿七日读。(墨笔)
- 5.卷三首:初十日校此。(朱笔)
- 6.卷三末:乙丑除夕重读。(墨笔)
丙寅七月十九日,灯下又读。(墨笔)
丙子六月再读校定刊本。顾广圻记于扬州寓中。(墨笔)
缺一叶:六。(朱笔)
- 7.卷四首:十二月初三日复校。(朱笔)
- 8.卷四末:十三日校至此。(朱笔)
丙寅正月十五日重读。(墨笔)
缺一叶:十卷(七)。(朱笔)
- 9.卷五首:十九日校。(朱笔)
- 10.卷五末:廿四日重读。(墨笔)
丙子闰月又读。(朱笔)
此三卷无缺叶。(朱笔)
- 11.卷六首:庚申三月重校。(朱笔)
- 12.卷六末:二月一日重读。(墨笔)
此无缺叶。(朱笔)
- 13.卷七末:二月十一日重读。(墨笔)
四月廿九日。(朱笔)
此三卷无缺叶。(朱笔)
- 14.卷八末:五月二十日校至此。(朱笔)
三月一日重读。(墨笔)
缺廿一卷(四、七)、廿二卷(九)。(朱笔)
- 15.卷九末:初九日又阅。(朱笔)
- 16.卷十末:廿五日校至此。(朱笔)
三月廿四日重读。(墨笔)
此三卷无缺叶。(朱笔)
- 17.卷十一末:四月十六日重读。(墨笔)
自卅二卷起,依《要义》所载校正。嘉庆丙寅,时在江宁郡中。澗蕢。(朱笔)
- 18.卷十二末:右皆《要义》校。澗蕢。共六卷,凡勘正二百许处。(朱笔)

19.卷十三首:六月十三日校始。(朱笔)

20.卷十六末:七月十三日。(朱笔)

缺四十七卷(十)、四十八卷(五)二叶。(朱笔)

21.卷十七末:无缺叶。七月廿六日校讫。(朱笔)

丙寅六月廿五日重读。(墨笔)

嘉庆庚申七月。(墨笔)

丁卯五月校。(朱笔)

十月再校。初八日写样毕。(墨笔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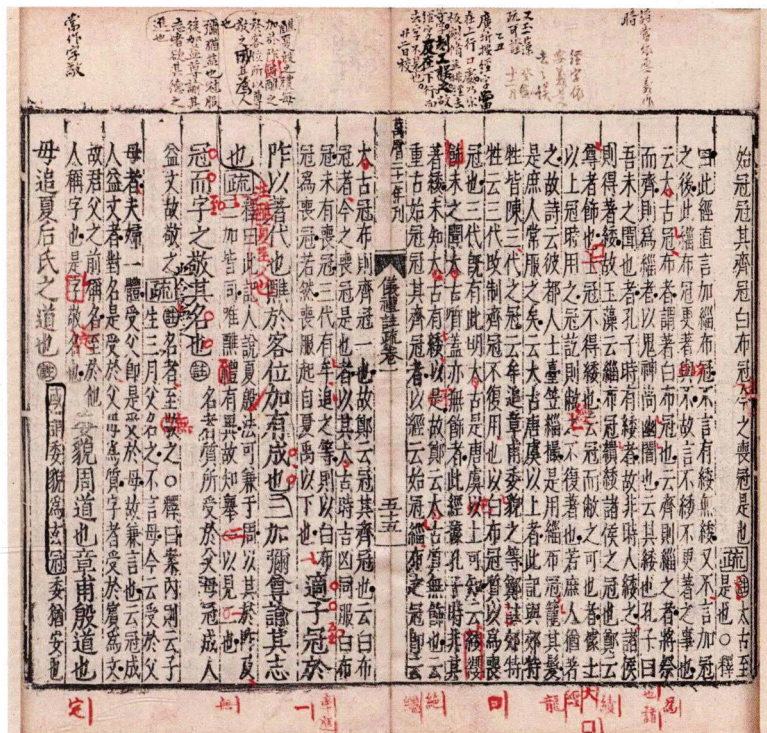
【作者简介】周慧惠,女,宁波天一阁博物馆副研究馆员。研究方向:版本目录、藏书文化。

·书讯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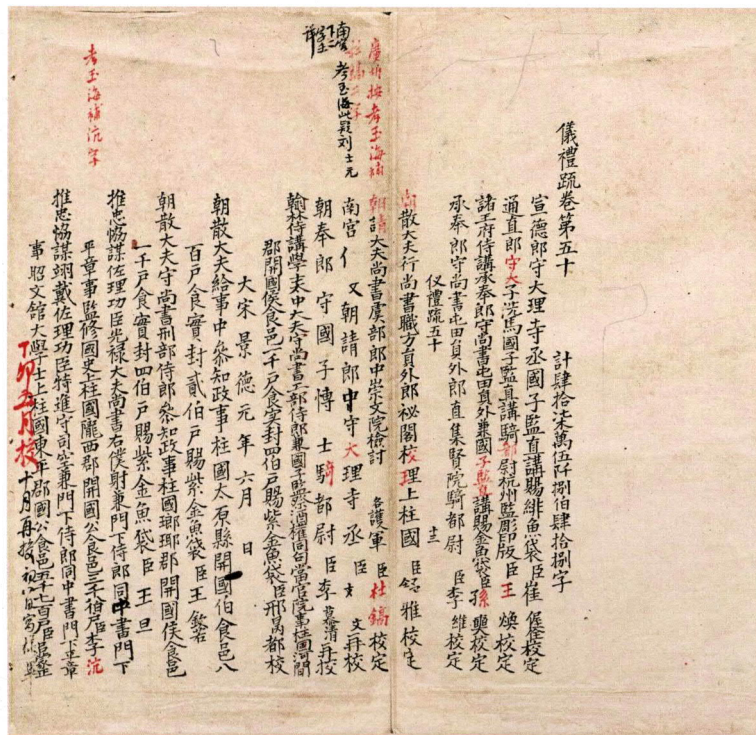
七经孟子考文补遗

16开 定价:5900元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5年10月出版

本书为日本山井鼎撰,日本物观补遗。原书用当时通行的明崇祯毛氏汲古阁刊《十三经注疏》本为底本,主校本则为足利学校所藏古写本、足利学校活字印本、宋刻本,参校本则为元刊明修十行《十三经注疏》本、嘉靖李元阳刻《十三经注疏》本、万历北监刻《十三经注疏》本、陆德明《经典释文》等,内容以版本对校、客观出校为主。这部校勘学上的巨著,乃是《十三经注疏》校勘史上的开山之作。该书传入中国后,比较系统地使用这一成果的是卢文弨、阮元两人。然而卢、阮二家使用山井鼎的成果,没有逐一注明来历,引用时又有错误存在,这都需要参照《考文》原书厘清根源或予以订正。本次影印以该书初刻本日本享保十六年(清雍正九年)东都书林刻本为底本,必将有助于《十三经注疏》校勘学史的正本清源。



顧廣圻對宋本因爛板、修板而产生闕誤的校語



顧廣圻在卷后补抄与校勘的诸臣名衔

(详参周慧惠《天一阁藏顾广圻校〈仪礼注疏〉考述》一文)